



任访秋 著

中國近代文学作家論

360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

任访秋 著

责任编辑 武国华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淮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62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60册
统一书号10105·421 定价1.20元

目 录

龚自珍	(1)
魏源	(26)
黄遵宪	(43)
严复	(59)
康有为	(82)
谭嗣同	(104)
梁启超	(130)
章炳麟	(147)
刘师培	(171)
苏曼殊	(197)
林纾	(211)
王国维	(227)
吴沃尧	(249)
李伯元	(262)
曾朴和他的《孽海花》	(273)
刘鹗及其《老残游记》	(283)

附 录

胡适	(296)
----	---------

钱玄同 ······ (316)

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 ······ (335)

后记 ······ (356)

龚自珍

一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清乾隆五十七年，生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中。祖敬身，乾隆己丑进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父丽正，嘉庆丙辰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他的母亲是乾隆时期著名的朴学家段玉裁的女儿，具有较深的文学素养，因此在童年，其母即授以吴梅村诗。^①十二岁，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就又教给他以许氏《说文部目》。十六岁读《四库提要》。由于他幼年经常生活在外祖父家里，而段氏是当时东南有名的学者，和他经常往来的多半是在文学上和学术上的知名之辈，因而定庵得以有机会和这一些人周旋，如臧在东、顾子述、恽子居、赵味辛等。^②加上定庵天资超绝，所以在诗文的创作和学术的研究上，早已名噪一时。所谓“貂毫署年年甫中，著书先成不朽功，名惊四海如云龙”^③等诗句，正说明了他当时的实际情况。

定庵具磊落不羁之才，早年抱澄清天下之志，^④但是遭遇不

① 《三别好诗序》

② 《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

③ 《能令公少年行》

④ 《己亥杂诗》

偶，二十七岁应浙江乡试，始中式，二十九岁官内阁中书，三十八岁（道光九年己丑）始中进士。后官宗人府主事，久困闲曹，于是寄情于诗，寄情于著述，寄情于醇酒与妇人。所谓：

“奇气一纵不可阖，此是借琐耗奇法，
奇则耗矣琐未休，眼前胪列成五岳。”①

“不容儿辈妄谭兵，镇物何妨一矫情，
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②

“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
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③

等诗，正是他这种生活的具体写照。

道光十九年，定庵乞假南归，越两年卒于丹阳，著有诗文集及其他论学著述数十种。

二

定庵的一生，正处在清王朝的统治由盛而衰的时代。在清代的初叶，由于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国，因而形成了民族的与阶级的双重矛盾。清王朝以严刑峻法，来镇压汉民族的起义运动。同时又屡兴文字狱，来诛锄士大夫阶层的桀骜不驯之气，从而使其统治权逐渐趋于巩固。但为时不久，统治阶级日趋腐败，政治上招权纳贿，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搜刮；生活上骄奢淫佚，置政治的颓败与民生的疾苦于不顾。加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已指向中国，洋货鸦片逐渐渗入。所以尽管在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实际在这时一面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于尖锐化，另一面同西方帝

①《己亥杂诗》

②③同上。

国主义的矛盾也有着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定庵生稟磊落不羈之才，又出身于三世为宦的家庭，世居京都，熟悉国家政治情况。特别是他遭遇不偶，早年科场失意，中年宦途落拓，于是以其锐利的目光，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分析当时朝政的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压迫。于是感于时代的将变，因而发为危言深论，揭出时代的病痛，提出革改政治的意见，于是成为中国提倡变法维新的先驱者。

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最盛行的为考据之学。当时有所谓吴皖两大派，就中特别是皖派大师戴东原，攻击程、朱，著《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同时如纪昀，在其所纂修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宋儒理学亦时有微辞。当时在文学上有所谓桐城派，标榜“学行程朱，文章韩欧”，卫护宋儒。这派中的学者方植之，著《汉学商兑》，来抨击考据学的破碎。此外在史学上又有浙东学派，重要学者如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也诋訾汉学繁碎，主张言天人性命必有切于人事，也就是理论与实际应该结合，不应空谈性理。另外又有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祿）之学，“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①

定庵生当嘉道之际，为当时考据学大师戴东原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外孙，幼年习闻东原之论，自不待言。稍长又读纪昀的《四库提要》，熟知程、朱理学之弊，所以在思想上他受程、朱思想的束缚较轻。其次他又深受浙东史学的影响，承实斋的“六经皆史”之论，对汉学的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也深不

① 《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

以为然。他在《著议之第六》中讲：

“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鋤，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费，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

特别是常州派兴起后，定庵颇醉心于庄刘公羊之学，而倾向于通经致用。而此种精神，与浙东史学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主张，颇有一致之处。所以定庵平生对当代政治非常留意，观察分析，终于揭露了当时现实中所存的种种矛盾，并大胆地提出个人的看法与主张。

首先他指出清代的君主专制，对士大夫的震荡摧锄，使他们廉耻道丧，形成偷惰畏葸之风。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而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允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荣之亢，辱之始也；辩之亢，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催锄其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①

① 《古史钩沈论一》一本作“覩耻”。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政府的官吏，只知唯唯诺诺，奉行故事，保持自己的禄位，什么国家，什么人民，都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之内。所以定庵在《明良论二》中指出当时仕风的泄沓情况道：

“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窃窺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洋洋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鳩燕逝而已，伏株下求俱压焉者鲜矣。”

他根据当时西方列强的强大，以及中国在长期专制制度的压抑下，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产，人民生活的困苦等情况，于是预言天下之将乱。他说：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清，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

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日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渐。……才者自度将见僇，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睭然，聵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论懸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①

至于怎样才能挽救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颓败的局势，定庵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在他早年写的《明良论四》中就这样讲：

“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侈也！”

后来又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中，从历史的发展，说明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由于法制的敝坏。至后一代之所以兴起，即在能纠正前代法制之弊。所以每一代的末叶，当法制出问题时，即应迅速的来革改。否则，就会有别人来起而代之。他说：

“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议，听其自墮，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

①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但是这种危言深论，并未能引起当时已经走向腐化的反动统治者的注意，因之也就说不上设法进行法制上的改革。所以在定庵死的前一年（一八四〇年），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的鸦片战争。他死后不到十年，太平军起义于广西，他的政治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

三

定庵在政治上是反对因袭保守一切成法和制度，而主张进行改革的。在文学上，也同样反对既有的成规，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的文章。他抨击八股文道：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种种，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龀之子弟，执笔学言，曰：‘功令也，功令实观天下之言。’曰：‘功令观天下说经之言。’童子但宜讽经，安知说经？是为侮经。曰：‘功令兼观天下怀人赋物陶写性灵之华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强之为若言。然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者，天下之父兄为之。父兄咎功令，宜变功令”①

① 《述思古子议》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定庵认为文章诗赋，必须是有见解，有感慨，不吐不快，不得不写，才行。至于一般童子为应试而写的八股文，并不是有什么见解，应试的诗赋，也并不是有什么感慨，结果是模拟前人，抄袭前人，写了一通，在别人看来就象是醉人的胡话，梦中人的呓语，连写的人也不晓得自己所讲的是些什么话。而构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结蒂，是功令，所以必须改变功令。

其次，他也甚不赞成桐城派文人所标榜的所谓文章义法。他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论述文章之产生，由于自然，但后人有意的根据前人的文章，条为义法，从而世代传授，他认为这是一种多余之举。他说：

“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语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语言变为文章。其业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清为若干家，厘为总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界人舆者，又必有界之者。曾曾云仍，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何也已。”

他说他自己，“不幸不戮于言，言满南北，口绝论文，瘠于苦甘。言之不戢，以为口实，独不论文得失，未尝为书一通，高扃笥中，效韩媿柳，以笔代口，以论文名。”^①从这一段话，很显然是对桐城派的讥讽。并且他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一诗中说：“学徒不屑谭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道。”也说明他与桐城的异趣。

此外特别是他的《病梅馆记》一文，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他的

① 《绩溪胡户部文集序》

进步的美学观点。他主张美要出于自然，更应该要健康，这才是真美。他反对从主观上来定出一个美的标准，然后用矫揉造作的方法，去破坏自然，损害健康，来实现一种病态的美。他痛斥文人画士们提出的美的标准，所谓“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其结果使一些鬻梅者，“斫其正，养其傍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其结果是“江浙之梅皆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桐城派的大师姚鼐所标出的写文标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是深不以为然的。他自己独不论文得失，原因恐怕就是怕这样会产生许多流弊。但从这里，也就看出了他的重视自然同健康的美学观点了。

另外就是他重视独创的精神，他鄙视因袭前人，人云亦云。他说：

“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蔽然而耻之。”①

又说：

“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领彼久定之云。”②

这是何等的自信精神！他在《己亥杂诗》中又说：

“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

正因为如此，他给后来的影响极大，戊戌时代的变法运动，以及文学改良运动，都是对他这种精神继续发扬的结果。

①、②《文体箴》

四

定庵的诗，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的思想情感，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同时代面貌。他的诗由于表现方法的曲折隐晦，及其在内容上广泛复杂，乍一读起来，感到扑朔迷离，莫知端倪。但只要经过一番细心研索，就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把它的全部内容贯穿起来。

我们知道定庵的时代，是一个矛盾斗争既复杂而又尖锐的时代。同时这种矛盾斗争，又非常鲜明地反映到定庵的思想意识中，因而又具体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定庵的思想，首先是他继承了中国儒家“民胞物与”的思想传统，关心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二云：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宗周若蠹蠹，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
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定庵把黔首看作骨肉，把天地看作比邻。而在整个的国家形势趋向崩溃的时候，他深深理解到个人与人民是同其命运的，所以他“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在他的诗中颇有一些痛心于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赋敛之重，与徭役之苛，以及在灾荒中人民的冻馁流离之苦。如：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裁禾！”①

①《己亥杂诗》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麋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①

“诗讖吾生信有之，预怜夜雨闭门时。
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②

在这样情况下，农业生产下降，物价昂贵，民不聊生。《在傅飮谣》中，诗人以极其形象的笔墨，写出傅飮的价格高了，个儿反而更小了，从而说明社会经济的趋势。

“父老一青钱，傅飮如月圆。儿童两青钱，傅飮大如钱。
盈中傅飮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噫，市中之俊兮天
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为过客，月语
傅飮：‘圆者当缺’。傅飮语月：‘循环无极。’大如
钱，当复如月圆。呼儿语若：‘后五百岁俾饱而元孙。’”

但在当时日益走上崩溃道路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丝毫的觉悟。一方面任用非人，另一方面仍然钳制人民的舆论。定庵在愤慨之余，不能不借吟咏史事，对当时黑暗政治进行揭发与抨击。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
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
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③

定庵对当时腐败政治是抱有改革的雄图的，他说“少年揽辔澄清意”，④又说“终贾华年气不平。”⑤在追述其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一诗中，表现出他的自信与自负。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
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⑥

①、②、《己亥杂诗》

③ 《咏史》

④、⑤、⑥、《己亥杂诗》

但是他的远大抱负，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他的见解同主张，在一般顽固守旧者看来简直是狂妄，是幼稚，因而遭到了谤议。至于对个人来说，不仅是无益，而且是有害，所以当他受到挫折，个人的理想成泡影的时候，就产生了退隐的消极思想。他曾写他的早年思想发展过程说：

“少壮心力殚，匪但求荣仕。有高千载心，为本朝瑰玮。人或玷功令，功令不任诽。屋漏胎此心，九庙赫在咫。天步其艰哉，光岳踵难恃。育气六合来，初日照蒙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无比。一夫起锄之，万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万夫怒用耳。目怒活犹可，耳怒杀我矣。去去一何求，买山请归尔。”①

在《寒月吟》中又写出要与他夫人偕隐的思想，说明所以要偕隐的原因，是“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最后写出偕隐的决心：“忧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隐不偕隐，犹如月一轮。”但是他又不能真个的退隐，他的豪情壮志，不能不寻找一种寄托，于是寄情于考索。《铭座》诗：

“精微惚恍，少所乐兮。躬行且践，壮所学兮。日以事天，敢不诺兮。事无其耦，生靡乐兮。人无其朋，孤往何索兮。借琐耗奇，嗜好托兮。浮湛不返，徇流俗兮。吁！琐以耗奇兮，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约兮。回念故我，在寥廓兮。我诗座右，荣我独兮。”

从事文献的搜罗，与古器物的考索，仍不能消除掉自己苦闷的情绪，于是歌颂义侠。

①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

“朝从屠沽游，夕拉骆卒饮。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鲠。传闻智勇人，伤心自鞭影。蹉跎复蹉跎，黄金满虚牝。匣中龙剑光，一鸣四壁静。夜夜辄一鸣，负汝汝难忍。出门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窥豫让桥，复瞰轵深井。长跪奠一卮，风云扑人冷。”^①

在这样心情下，使他对陶潜的退隐，和陶诗中某些诗篇，有着进一步地体会。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由歌颂豪侠，进而希望革命。在前边所引的《著议第九》中，即明明指出在专制政权压迫下，一些才智之士不甘于被戮，其中雄且悍者，就期图起而造反。另外他又在《尊隐》中，刻画出革命风暴卷起的前夕，暂时寂靜的情况：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因此定庵到晚年追忆早年表现自己理想的作品时，还说：

“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②

定庵当自己早年梦想成为虚幻的时候，曾借考索与诗文来消磨自己的豪情壮志，但为之既久，又觉厌倦，于是就又转向声色，并且逃佛学禅。《己亥杂诗》中道：

①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

② 《己亥杂诗》